

童年记忆与求学之路（五）



吴官正

清华大学是考上了，愁的是到北京去的路费。我找到村里，了解到我家秋季可以分得24元钱，要求提前给18元。村长说要向乡长汇报。我找到乡长，提了这个要求。他想了一下说：“不行，你没钱可以不读呗。”当时我几乎气炸了，但没做声，回到家里默默地流泪。后来张锦裳的大哥给了20元、细叔给了18元、高家姐夫给了8元，总共46元，准备从鄱阳坐轮船到南昌，再乘火车上北京。

出发前，我同张锦裳到学校去辞行，在校门口遇到杨辉副校长。他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你为学校争了光。你家困难，上饶专区教育局给学校50元钱做困难学生的路费，决定给你20元。”我高兴极了，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！去会计那里领了钱，又去教务处领了毕业证

书。发毕业证书的老师说：“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你土里巴叽的还能考上清华大学，看不出来。”我笑了笑，想到还有那20元钱，点了点头出去了。

从南昌到北京怎么走，我也不知道，只能打听。到南昌火车站一问，才知道没有到北京的直达列车，坐慢车要两天两夜，票价是13.6元。慢车站站都停，到汉口转车时，已经坐得头昏脑胀。我走进一家餐馆吃饭，看到红烧鱼七角八分一盘，就要了一盘，还以为是最便宜的，哪知吃了一会儿，再往黑板上看，傻眼了，这是贵的，其实一角二分或二角钱的菜也有。当时心里真后悔，嘴里也没味了，鱼也吃不下去。坐了一会儿，就离开餐馆去排队等火车。

在火车上一直坐着实在太难受，就在一个长座位上躺了下来。有旅客来问，有人吗？我回答没有，并起身让出座位。那位想坐在我旁边的旅客把东西往行李架上放时，我抬头看了一眼，结果他拎起包就走了。我心想，他一定把我看成小偷了。我上穿一件土布衬衫，下穿一条毛士林短裤，没洗脸，没洗脚，身上有股酸臭味，也难怪别人这样看我。我倒觉得蛮好，来一个旅客问，我就看

他的包，人家马上就提包走人，让我睡了个好觉。

9月8日，到了北京前门站，天气有些冷，接站的同学很热情，拿了一件旧大衣给我穿，说先报到，还问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，我说：“80斤粮票，钱只有一点儿。”的确，我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，只有一件张锦裳给的旧棉袄，一条长裤，一双布鞋，一床父母床上的旧被子。同学们很好，说你是从农村来的，没关系，给你发10天的伙食票。

学校很棒，给了我甲等助学金。由于高等数学已自学到大学三四年级的水平，因此学习一直很主动，成绩也好。

入学不久，开始分班，我分在动力系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班。班上共21人，戴眼镜的不少，大多穿得像模像样，而我又黑又瘦，衣服又旧又不合身。当时辅导员吴荫芳老师要我当班长，我说：“不当，能否当个团支部委员？”吴老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想到高中被整的痛苦经历，脱口而出：“我不想整别人，也不想挨整，当个团支部委员挺好。”吴老师哈哈大笑。他很有涵养，真的提名我当团支部委员。心想今后自己不会再被整了，很是得意。大学三年级时，我被选

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，与同学关系处得都很好。家庭出身不好的，思想“不太进步”的，都同我谈得来。在大学六年中，我没有整过一个同学。全班同学在“文革”中和后来，也没有犯错误的，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同学们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
这年是国庆十周年，学校组织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活动，我心情非常激动。9月30日，全班同学每人发一斤八两干粮，下午六时出发，走到五道口车站，等了约一小时，再乘火车到西直门车站，又排队步行，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到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才到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场附近休息，此时干粮已吃掉了一斤，口渴就喝自来水。八点多钟，队伍又开始移动，在东长安街边第一次看到坦克、大炮、重机枪，十分兴奋。不到十点，林彪开始检阅部队。阅兵结束后，接着游行。当我们走过天安门城楼时，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，我们大声喊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毛主席喊：“人民万岁！”那时的热情、激情，真是情不自禁。下午四点左右，我们走到西四停下来休息，吃干粮，喝自来水，只剩下两个包子留到晚上吃。下午六时左右，队伍又返回到天安门广场跳舞，看放烟花。我从来没跳过舞，女同学拉着手教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大家都在跳，就数我跳得最蹩脚。晚上十点多，人群逐渐散去，我们又回到西直门，乘火

车返校。到学校时，已是10月2日的凌晨。

北京的冬天来了，寒风刺骨。我上身穿张锦裳给的旧棉袄，下身穿一件绒裤，脚上还穿了袜子，尽管天很冷，却很满足。每天六点之前起床，洗漱后在食堂买两个窝窝头，里面塞上咸菜，一边吃一边走，去教室占位子。

给我们上课的老师，年长的大多戴着“右派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之类的帽子，有这样那样的所谓“政治问题”，年轻老师中也有右派，还有苏联老师。老师们上课都很认真负责，书教得实在太好了。有一年过春节，我约班上几位同学去看方先生和宗先生。宗先生说：“你们来了，我是右派，你们知道吗？”我说：“听说过。我们来给你拜年，你是先生，你的书教得很好。”师母很高兴，忙着拿糖果给我们吃。

生活困难的那几年，学生每天粮食定量一斤一两，早餐三两，中晚餐各四两，油和肉定量都很少，连蔬菜也是每天定量供应的。年轻人饭量大，肚子里又没油水，经常饿得难受，我脚脸都浮肿了。为改善学生的营养，学校从北大荒搞了些大豆，一个月分给我一斤。

大学二年级时，还是选我当了班长。这年春节，学校宴请留学生，我被指派作为中方学生代表之一参加宴请和联欢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那么好，也是第一次喝红葡萄酒，

十分开心。我没有尝试过自己的酒量，不知道葡萄酒也会醉人的，一口就喝了大半杯，不到几分钟，就觉得头昏脑胀，天旋地转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吐得精光，事后想起，后悔不迭。如此一顿美味，吃进去又吐了出来，确实可惜。

在经济生活困难时，同学们对食堂很有意见，换了几个人都没办好，系领导决定让我代表学生去参加食堂管理。我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，作了许多改进，伙食也有些好转。半年后因营养不良，身上浮肿，组织上要我回去休息，我没有同意，最后到底还是挺过来了。

1961年冬天，晚上常饿得肚子痛，有时爬起来喝自来水。在同学议论毕业后干什么时，我说：“说心里话，只想到北京饭店端盘子，人家吃剩下的，我去扫盘饱吃一餐，就心满意足了！”同学中有人说：“你还是团支部书记，讲这样的话？”我说：“肚子比思想过硬，有什么办法？”大家都苦笑。大雪纷飞的时候，同学们都很高兴，盼来年农业丰收。我说：“瑞雪兆丰年，粮食翻一番，八月十五大会餐。”同学们都乐了。

由于自己要求进步，积极申请入党，一年多之后，经组织审查，认为我品学兼优，符合入党条件。1962年3月21日，由高成、米盈野作为入党介绍人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一年后按期转为正式党员。■